

## 經典的政治經濟學之「經濟人」模型及其意涵

洪鎌德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廖育信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 摘要

本文從經典的\* 政治經濟學之鼻祖亞丹·斯密的《國富論》談起，析述李嘉圖國際分工與商貿的比較低成本理論和地租說，兼及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道德自制，以及薩伊的供需均衡說，最後及於約翰·穆勒工資基金理論。在綜合經典的政治經濟學說對人的看法之後，得出這些經濟學家把人視為擁有理性、計算、抉擇能力、承擔後果的「經濟人」之結論。只是在今日社會組織脈絡之下，經濟人有轉型為「行政人」的必要。這種經濟哲學對國際貿易的關係與運動的意涵，在於參與賽局者如何精打細算，忍受競爭過程上的熬鍊，由挫敗轉勝的策略，俾追求稀少性、匱乏性的價值——承認、榮譽、獎勵，更強調商場上與運動場上都要講究競賽技巧、遵守遊戲規則，進行合群與公平的競爭，這才是所謂的運動精神的發揮。

**關鍵字：**經濟人、分工、商業與自由、放任無為政策、行政人

---

\* Classical 過去華文譯為「古典的」，作者頗不以為然。「古典的」係指古代希臘、羅馬時代的經典著作。近世（文藝復興時代以來）的作品宜用「經典的」字樣，以突顯其典範之意義，且與古希臘、古羅馬有所區隔。

## 壹、前言

經濟活動（economy）產生於人慾望的無窮，以及滿足無限慾望的財貨（貨物與勞務）的匱乏與稀少。在古希臘這是家計（household）的同義詞。對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經濟現象因果性、系統性、科學性的研究則是近現代歐洲，尤其是英國思想家所做的努力。第一位使用「政治經濟學」（*économie politique*）這個概念的來做為一門學科之思想家，為法國人蒙希赫田（Antoyne de Montchrétien, 1571-1621）。他使用這個名詞的年代為1616年。過了一個半世紀以後，英國人司徒亞（Sir James Steuart, 1712-90），才把這個法文字眼以英文 *political economy* 的面目呈現給世人，因為他在1767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的原則》（*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洪鎌德，2005：27-28）。這本英國的政治經濟學之大作，9年之後便被亞丹·斯密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之盛名所掩蓋，從此之後很少人（除了馬克思之外）在提及司徒亞這本經濟學的名作。

除了司徒亞與斯密之外，英國最早留意經濟發展對社會衝擊的學者中，要算哲學家與史學家休謨（David Hume, 1711-76）最引人注目。他雖不是專心致志於經濟現象之觀察和分析，卻留意商業的成長，自由貿易的推動和工商獨佔的廢除。其思想大大影響其後斯密的經濟學說。

可以說在18世紀與19世紀中葉，這6、70年間為英國產業革命的高峰，也是經典的政治經濟學最興盛的一段時期，除了休謨、司徒亞和斯密之外，尚包括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32）和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 1772-1836）。此外，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71-1834）、洗紐爾（Nassau William Senior, 1790-1864）、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73）也是傑出的經濟學者。連法國人賽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與德國人馬克思（Karl Marx, 1818-83）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95）都可以列入經典的政治經濟學行列中（洪鎌德，2005：25-32）。

在英國把政治經濟學的理念廣為傳播的組織為 1821 年成立的「政治經濟學俱樂部」和《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這一學報(Home, 1991: 79)。

## 貳、亞丹·斯密的貢獻

早在撰寫《國富論》(1776)之前,亞丹·斯密便以道德、哲學和倫理學的眼光來討論人的經濟活動。他讚美所謂「聰明的」經濟活動者。他說:

聰明的人在抑制當前的舒適和快樂,暫時忍受辛苦和節儉之苦,以成就來日更大與經久的舒適和快樂,這是贏得旁觀者十分讚賞的。聰明人有此企圖,有所作為,則非如此茹苦含辛不可。他之所以肯做這樣的犧牲,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明智的舉措,而不是一時輕率的決定 (Smith, 1949: 265-67)。

人在經營社群生活表現了愛慾、感受等天性,但天性卻必須接受理性感知的中介、管制,才不致引發人間的糾紛、亂象。是故道德情操是上天安排人類社會活動一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

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的源頭無疑是亞丹·斯密對重商主義的攻擊。所謂重商主義為 17 與 18 世紀歐洲英、法、荷等商業發達的國家為了本國金銀、財貨的累積,不惜採用保護主義的政策,鼓勵把外國便宜的原料輸入,而把本國加工製造、價值增高的成品輸往他國或殖民地,從而造成貿易的出超、財富的增加和國家的富裕。這是 17 世紀歐洲國際為爭奪海外市場與殖民地所展開的國際貿易戰爭。其理念來自湯馬斯·閩 (Thomas Mun, 1571-1641),其後受到皮梯 (Sir William Petty, 1623-87)、喬爾特 (Josiah Child, 1630-99) 等人之贊成,連擔任法國路易 14 財政大臣的柯爾伯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93) 也熱衷這一理念,而形成英、法兩國的財政政策。這種主張被法國重農學派的學者米拉波 (Marquis de Mirabeau, 1715-89) 稱做

「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米拉波與斯密都抨擊重商主義利己而不利人的保護主義之政策。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應採用互利、合作的自由商貿；不當排斥，甚或關閉國際（外國）的市場，妨礙國際的分工，導致有關國家的經濟成長受到抑制。斯密還指出，成長還靠生產的勞力壓倒服侍的勞力，前者指貨物產品的生產活動，後者指人事服侍的勞務活動。一旦可以減少人身服侍的費用，而增加了人員直接從事生產雇用所需之金額，則資本可以累積。在成長的經濟裡頭資本累積明顯增大，那麼工資也會水漲船高、節節高升。這是他與其他經典政經學者所樂觀其成的過程，因為他們都同意高升的工資是對勞動者勤勉之鼓勵。

斯密以及其他經典學者都把經濟問題視同為人與天之間的鬥爭，也就是人企圖從自然界開拓出財富來。在這番天人交戰中，勝敗取決於人的勞動之效率。是故勞動產生價值理論及其衍生的產品之價格，這種價格取決於勞動的說法成為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家的口頭禪。

與後來的新經（古）典學派，例如邊際效用學派的主張不同，斯密等人是主張擴充資源，俾在分配以後鼓勵更大的經濟成長。可是 1870 年代，特別是吉翁士（W. Stanley Jevons, 1835-82）、孟額（Carl Menger, 1840-1921）以來的新經典學說確認為經濟資源有限，人的選擇偏好彼此競爭，必須在考量邊際效用下進行理性的選擇。不過後者多少受到主觀心理學的影響，不如前者訴諸經驗事實的考察，是故經典的（早期）的政治經濟學更擁有經驗與實證的意涵，且可以指引政治學家促進經濟的成長。

儘管《國富論》為首部政治經濟學完整的巨作，但卻是斯密之前所寫《道德情緒的理論》（1759）之延續，亦即含有濃厚哲學思辨的色彩。蓋《國富論》的結語仍重複之前倫理學著作所揭示的人類激情同理性相互拼搏鬥的主張。由此他演繹人類從漁獵、畜牧、農耕而至工商的社會發展史的四大階段說。

每一階段都與其相適應、相搭配的制度來滿足人類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在第四階段的工商社會中，法律與秩序所保障的私有財產成為此時社會

最重要的機制。斯密甚至指出：文官政府成爲保護富人的私產以對抗窮人的機構。造成社會變遷與歷史遞嬗的驅力來自於每個人理性指引下自求多福、自我改善的欲望。

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夠維持，導因於人性中的激情與理智兩種面向。社會制度的機制便在節制個人或團體激情的出軌。這種機制包括競爭在內。爲追求自我改善與福利的機制，或造成輸贏得失的結果。這種公開、公平的競爭，無異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管制和指導社會的經濟活動。這也是在市場運作之下，產品的價格常在供需左右下邁向自然價格之因由。

顯然，斯密是第一位思想家，企圖把市民（民間、公民）社會從政治國家中拆開。他認爲一般市民在市民社會中有能力自行解決其生活所需的物質之生產、交流、分配等問題，而力避免政府（政治國家）的干預。在《國富論》中，他把人們的自由與商業聯結起來，商業的發達與自由的抬高是相互提攜增進。商業是走向福裕繁華的捷徑，也是人群擴大其自由的場域。商業發達的條件，包括典章制度（包括長子繼承制）的阻礙之清除，國家商貿（重商主義）保護政策之取消等等。是故自由的商貿活動、企業自動自發的創思、發展爲提升商貿之不二法門。一旦商人經營企業成功而致富，則可以擺脫政治的專權，從而促成其個人自由的激增。斯密是把商業與自由的關連，加以揭示的第一位思想家，亦即商業的增大強化自由，自由程度的擴增強化商業活動。他指出商業是走上繁榮的捷徑。只有商業不受阻礙地繼續發展，才能保證社會最大的繁榮。自由成爲繁榮所不可或缺的關鍵。把商業擴展到海外甚至全世界，將造成國家財富的累積。此時財富不再是固定不變的金銀財寶，而是可以自由運轉的貨幣和流通的商品，則商人變成獨立自主的人，也就不受政治宰制的束縛，而享受自由增大的滋味（McLellan, 1991: 426-27）。

再說，身處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的早期，斯密看出工業製造與生產的重要性。工業生產的產品之激增，亦即生產能力的提高，可以把它運輸與銷售到各地市場。由是顯示分工與市場之間的互動是財富增加的不二法

門。這種看法使他擺脫重農學派視土地為財富的源頭之狹隘觀點，也擺脫以鄰為壑、利己不利人之重商學派之窠臼，證明生產獲得多餘的財富，不能單單由農業活動而取得，更非國庫中儲備的金銀財寶。反之，是可以供買賣流通的商品。把商品售賣所得，再投資、再生產、再流通，必使財富增加迅速而龐大。

斯密之所以重視分工的好處，是由於（1）同一職務反覆操練與執行可以使工作者熟能生巧、增加效率；（2）減少從一項工作轉向其他工作時間上的浪費；（3）分工引向機器的發明與應用，減少勞力的浪費。分工造成對資本累積的需求，也是勤儉等經濟道德的養成。但分工擴大的程度卻受限於市場的大小與人口的多寡。人口的膨脹與財富的增加有互動的關係。

斯密主張政府放任無為，完全讓個人追求其自利，蓋每個人會清楚知道其利益之所在。個人在追求自利之時，間接促成公共利益的成長。事實上，個人理智的發揮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建立。個人利益圈在面對公共利益圈時，顯現自立自主，而又中規中矩。是故經濟運作是理性的表現，不需國家的介入，單靠民間社會的運作，經濟秩序便會順暢推行。

一如前述，斯密認為財富存在於可供買賣的商品（而非國庫金銀寶物之儲存）之上，而創造商品的來源為前面提到的勞動力（勞力）。勞力是生產和促成社會繁榮的主力，故應當把勞力當成商品價值的衡量標準。勞力不只是商品衡量的準繩，更是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

要之，《國富論》的重要性至少包括以下三點：

其一、它是第一部有系統、有組織，善用理論與資料的經驗性、實證性的經濟學著作，也是經濟哲學、經濟科學、經濟政治學、經濟社會學的典範作品，亦即經典著作。

其二、《國富論》是自古至近現代（斯密所處的 18 世紀）最為廣包（範圍涉獵最為廣泛）、最為博徵，也是求知野心最大、最顯露的一部不朽之作。

其三、《國富論》不只是經驗性、描述性、事實鋪陳的「科學」之作，它更是帶有評論性、規範性、政策應用性、「實用倫理學」的偉構(Viner, 1968: 325-26)。

隨著斯密大作出版之後，後來的政經理論家都提出相關的經濟問題，我們把這些問題歸納為以下五個子題：(1) 歷史進步的經濟解釋；(2) 透過分工與交易的擴大財富累積和經濟成長的理論；(3) 對財富重新界定，不只是財富為金銀的持有，更是商品及其生產；(4) 個人行為的理論，是個人自利的追求與公共利益的增進不相違背，反而促成公共利益的成長。因之，主張政府放任無為，或國家權力縮小至「起碼的（最低限度）國家」(the minimal state)之理論；(5) 勞力價值說，認為勞動是價值的來源與衡量的主張 (McLellan, 1991: 426-27；洪鎌德，2005：31)。

### 叁、李嘉圖的經濟學說

李嘉圖便是斯密《國富論》中涉及(3)、(4)與(5)三項子題，加以檢討的經典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經濟學與徵稅的原則》(*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探討社會中三種階級（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的社會產值之分配。他發現商品的價值與投入的勞動數量成正比，資本家的利潤與工人的薪資所得成反比。一旦人口增加，地租也提高。人口若膨脹過快，則薪資有被壓低的態勢。在耕地擴大下，地租上升，利潤會減少，資本形成困難。李嘉圖不但繼受斯密的學說，還踵事增華，加以精緻化。李氏指出勞動價格（工資）是從事勞動時間的長短來規定的。他尚未發展到像馬克思分辨抽象的勞動與具體的勞動之地步，也不懂分辨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與個人確實的勞動時間。換言之，他不像馬克思分辨勞動與勞動力（勞力）之不同。不過由於李嘉圖指出商品相對的價格係由投置於生產該物的勞動時間之長短所規定，因之，他打破向來錯誤的說法——工資增加會導致價格的升高。

李嘉圖認為地租只是財富的轉移，而非財富的來源。因之，除了工人與資本家可以藉勞力與資本賺取財富之外，地租不可視為生產的成本。隨著必需品成本的變動，利潤的多寡與工資的高低同時變化。人口一旦增加，地租也趨向昂貴。除非人口激增而壓低工資，否則工人無失業之虞。他也認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並非由於生產成本相對的不同而引起的；反之，卻是由於國內價格結構之不同，而反映了交易的相對利益，這才會促成國際間貿易的頻繁與熱絡。

此外，李嘉圖曾經為英國的銀行大量發行紙幣和擴大信貸，而擔心英國國庫黃金儲量之減少，以及英鎊匯價的貶值，由此展開的中央銀行運作理論，這對 19 世紀初英國財經界的影響重大。

李嘉圖經濟學思想的核心，是認為自然資源的短缺（稀少性）對導致經濟成長或早或晚的停滯不前。為了解決一國經濟成長的遲緩，他訴諸對外貿易，提出比較成本與國際通商理論。斯密早已提過每個國家按專長生產費用較少的商品來交換他國製成（但在本國生產，卻要付出較高的成本）的貨物，這樣會得到比較的利益。這種 18 世紀自由貿易的說法，被李嘉圖與其他經濟學者發展為比較（低）成本的理論。譬如在英國生產布料，比生產葡萄酒的花費較低，而葡萄牙生產紅酒的成本比生產布料的成本更低，則英國布料與葡萄牙的紅酒進行交易，可使兩國都享受相對的低成本。因之，也得到比較性的利益。這樣交易的結果，讓兩國付出較少的代價，而得到同時享有布料與紅酒的好處。這就是國際生產分工與貿易合作的比較利益說。

李嘉圖進一步指出，世間存在一個「種類〔人類〕自然的分配」(nature distribution of species)，使進行貿易的諸國在沒有採取關稅之前，讓彼此的商貿朝向均衡，而且在通商國之間造成有利本國（比較利益）的商品之專門製作。而後相互交換。這就說明即使本國工資水平較高，也沒理由阻止這個國家與外國通商 (Blaug, 1968a: 510)。

要之，李嘉圖勞動價值說多少影響到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李嘉圖只談

價值論，而不像馬克思發現了剩餘價值理論。不過最早提出勞動價值觀的人是斯密而非李嘉圖。這是看我們怎麼界定勞動價值論：假使把勞動價值論當作勞力是商品相對價格之決定因素看待，李嘉圖不是此一理論的先驅；不過如果說勞動價值論指涉的是貨品交易的比率在數量上受到勞動代價的影響大，受到利率的影響小，則為李氏的貢獻，再說他在不考慮需求的情形下，堅持著價值成本說。此外，他的勞動價值說從不與利潤性質中抽繹出來的事物有關，這點也與馬克思的觀點相反。換言之，不因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者對李嘉圖的讚賞，而誤導李氏的學說對馬派經濟思想有這麼重大的衝擊（Blaug, 1968a: 510）。

在比較李嘉圖《原則》與斯密的《國富論》時，我們發現後者對經濟系統操作的一般性描述比前者高明。再說，經濟問題如果是涉及有限手段來追求無限目標（而且目標之間相互競爭），斯密的貢獻也遠大於李嘉圖。不過在涉及國際貿易的探討時，李嘉圖的看法更遠、更深，且在經濟分析的方法上更為細膩、更為高明。他所使用的理論模型不但範圍更為廣大，而且實用性也更高。《原則》一書有五分之一篇幅討論稅收的問題。李嘉圖把稅收、徵稅同資本累積、所得分配和物價水準掛勾，亦即對徵稅的經濟後果做出分析，而影響他對經濟理論的架構，也展示他對邏輯推論能力的卓越。

## 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馬爾薩斯的父親是盧梭的朋友，他們認為人理想的平等會有實現的一日，只要藉著教育與宣傳，把私人的無知與公眾的惰性加以清除便是。對於父執輩的這種夢想，年輕的馬爾薩斯頗不以為然，而認為人類追求完美的社會常受人口增長與食糧不足所打亂。在其父親督促下，32 歲的馬爾薩斯寫下《人口原則的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1798）。此文引用當時幾名英、法

哲人的意見，談不上有什麼創意或新思。不過此文主要在抨擊他所處時代不憂慮人口過多，反而擔心人口不足的流行想法。後來由於英國人口遽增，輿論界的態度也有所改變，遂促成馬氏在 1803 年出版《人類幸福的過去與現在效應》（*A View of Its Past and Present Effects on Human Happiness With an Inquiry into Our Prospects Respecting the Future Removal or Mitigation of the Evils Which It Occasions*）。此書經歷數次修正，最後第 6 版在 1826 年出梓。

除了有關人口學的著作之外，馬爾薩斯也出版《政治經濟學原則》（1820）、《政治經濟學的定義》（1827）等書。他在人口學著名的觀點：在沒有遏止之前，人口將會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增加，而糧食的供應卻是以算數級數的方式成長。因此人口成長的極限為「維生資料」（means of subsistence）所能提供的界線。在現實的世界中存在各種各樣的遏止機制（超過綜合可以養活的界線之外的激增）。遏止的機制有「正面的」（面對面的像戰爭、飢荒、瘟疫等），也有「預防性的」（像墮胎、殺嬰和節育措施）。這兩種防阻機制都是由於糧食供應不足之緣故，也成為人口成長最後的阻卻力量。

這種主張馬上引發爭議，批評者指出發達的社會中，工人階級的收入足以讓其家大小存活在起碼的衣食住最低要求之上。是故在《人口原則的散論》再版時，馬氏提出「道德節制」為阻卻人口激增的新辦法。道德節制指晚婚和婚前性生活的避免、性慾的抑制而言。

馬爾薩斯要求工人階級實行道德節制，而不要讓此一階級的子孫大量繁殖，這當然是英國資產階級狂妄自大的心理之反映，也是上層階級反對改革、或不熱衷政治改革、社會改良的藉口。貧窮的根源一旦視為人口與維生資料（糧食、衣服、住房等民生用品）之間的失衡，則改變這種「宿命」的關鍵便成為工人階級道德節制的職責。而工人所得薪資維持在生活線的最低限度下，亦即在存活所必要的低工資，也成為馬氏人口論下的必然結果。

由於 1780 年代至 1800 年間差不多 20 年裡，歐洲人口一時之間激增，導致人們誤以為馬氏 1798 年的《散論》是先知性的預言，或及時的勸世箴言。可是到 1890 年代，由於科技進步和家庭採用節育措施，人口大舉膨脹，糧食不足的說詞完全被戳穿，馬氏甚囂塵上的人口論徹底失敗。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典型的學術化妝例子，也就是把形而上學裝扮成科學。假使吾人同意他的看法，認為生育節制是應大力鼓吹的話，那麼 18 與 19 兩個世紀之交的人口增加證明他是錯的，因為看樣子只有「災難」和「罪惡」可以阻卻人口數目增大。反之，我們如認為節制生育在道德上講得過去，那麼他主張的「道德節制」做為人口增長的制衡卻是行得通的。總之，馬氏的人口理論都可以應用在想像的或實際的人口改變之上。因之，他的學說儘管是以科學來化妝的形而上學，還是頗難反駁、拒斥（Blaug, 1968b: 551-52）。

## 伍、薩伊的供需均衡說

法國哲學家薩伊曾至英國，在保險公司工作兩年，是法國大革命的擁護者，曾任評論雜誌編輯，對亞丹·斯密的經濟學說十分心儀，企圖把《國富論》英國式的思考與表達方式轉換成適合法國知識分子熟悉的用語與論述的樣貌。他曾經想要把政治經濟學作為道德主義與理性主義的折衷學科看待。因之，多少採用重農學派的研究途徑來思考經濟問題，把經濟學和一般科學當成生理學，從個人層次提升到社會層次的學問。

薩伊並無方法學的專著問世，其所使用的方法表面上是對科學事實的強調，但背後卻隱藏他個人的主觀心態。與其說他是一位科學家，還不如說他是一位「意識形態家」（ideologue）更為恰當。他讚賞斯密《國富論》正標誌真正政治經濟學的誕生，比斯密更有系統、更徹底地批評了重商主義的主張。他甚至把「生產能力」擴大解釋，涵蓋了實質的貨物與非物質的勞務（這也是經濟活動的成果）。由是他把需要和效用（功利）引進到

價值的探討上，因而他的價值理論比斯密這方面的論述還深刻。他指出：人的需要可以依其解決、滿足的緊迫性來分類。需要的不同種類產生了需要的客體呈現其效力、功用。產品的用途（功利）決定了需求的大小。需求與供給的互動成爲市場的運作，而供給又取決於生產的成本。與李嘉圖相反，薩伊認爲效用對價格的規定產生更爲強烈的決定性作用。比起生產的成本扮演限制的角色來，效用是造成價值高低的主因。從上面的敘述可知，薩伊在解釋價值與價格時，不採價值影響價格單一方向的因果關係，而採用互動（辯證）的觀點。

與斯密以社會醫師的心態來處理經濟毛病，薩伊採用自然科學家（自然主義者）之眼光，以觀察來解釋現象，亦即採用嚴格的知識體系來對經濟現象做「簡明的敘述」（simple exposition），俾在各種情況下都能一體通用。

當斯密所處的時代農業仍舊扮演生產界的龍頭地位之際，薩伊的時代卻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鼎盛時期，法國也進入工業發展的初階。是故薩伊把工業與商業（他一度經商7年）視同農業作爲社會總體生產活動之場域（一鼎三腳）。

薩伊在政治經濟學上最大的貢獻便是提出供需平衡的市場律，認爲供給會創造其本身的需求。他說「產品爲的是交換〔別的〕產品」（products are changed for products）。這表示產品與產品交換、交易的媒介——金錢，並沒有扮演那麼重要的角色。這句話也可以解釋參與交換的人在意的的是其交換伙伴從中得到好處、繁榮。這句話便與重商主義者所言，在交易中「一方的所得，便是他方的損失」完全相反。這句話也可以說反駁生產過多、消費過少造成的「剩餘的危機」理論（glut theory）。這種供需失衡，在薩伊心目中便是暫時的、短暫的現象。換言之，薩伊不認爲經濟的衰退是由於需求不足引起，而是在短暫時期中有些市場生產過多，另一市場生產過少所引起的情況。這種不平衡的狀態早晚會自我調整，因爲生產過多，生產者會調整其生產方向，俾接近消費者的偏好，否則要被逼退出市場、另謀他就（洪鎌德，2005：10）。

值得提起的是薩伊重視「企業家」在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英國人傾向於把企業家當成資本家看待。可是企業家有可能是農場的經理人、工業家、生意人等身分，他們在經濟生活中佔著戰略性的制高點，可以調和地主、資本家、勞工和消費者的利害關係，使生產、分配得到和諧的、有效率的運作。特別是在工業部門使生產發揮最大作用的組織、協同工作，人力與機器，管理與行銷的推進在在都需要企業家。不過，有關企業家及經營之效力與貢獻，卻要等百年之後才由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進一步來詳細論述（Leduc, 1968: 25）。

## 陸、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

作為功利主義學派最重要的思想家，詹姆士·穆勒之子的約翰·穆勒，俗稱小穆勒，不但是一位政治經濟學家，更是 19 世紀英國最了不起的哲學家、倫理學家、邏輯學家、政治思想家，其學問之廣博深邃，影響當代自由主義與民主思潮之落實，尤有重大的貢獻。其晚年心態上傾向於社會主義，雖非馬派的社會主義，卻促進了社會民主的運動和費邊社社會改革運動崛起，實在令人景仰。

小穆勒所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則》三卷（*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卷一 1848，卷二 1849，卷三 1852，被譽為 19 世紀後半葉經濟學者無可辯駁的聖經）。在該書中，作者綜合前哲細心分析國際商貿、利息和經濟規模的大小，但其卓越之處為分辨生產與分配兩大經濟範疇之不同。生產者受到自然演變的規則所支配，分配則受後天人工的制度所型塑。換言之，前者較受天然的規則所影響，後者則受到人群的控制。做了這方面的分辨之後，穆勒認為政治經濟學可提供經濟生活的重新組織提供場域來發揮他最關心的道德之改良。

在社會、道德等方面的改良中，最令他留意的無過於工人階級的教育、訓練、養成。此外，最主要的改良目標為家庭的計畫，也就是落實馬爾薩

斯關心的「道德節制」之理想。穆勒還發現工會對於勞工生活與工作條件的改善扮演推動的角色。最先他替勞工權益、福利辯護，就像普通支持勞工團體的作法一樣，透過工會與資方協商工人最低、最基本的工資，認為有附和「工資基金」(wage fund)說法之必要，後來他對工資基金的想法有所放棄。所謂「工資基金」乃為一個時代、一個地區、一個工廠雇主能夠給付所屬全體勞動者工資之總數，此一總數的定額是以歷來經濟的表現為衡量的標準。好的經濟表現就給付給勞動者較高的薪資，壞的年冬則薪資緊縮。在一般的大眾辯論中。這種「工資基金」的說詞意涵是當有些工人群體的報酬高時，會導致另外群體的報酬低（因為全體工人的薪資總和是固定的、不變的）。早期穆勒在提「工資基金」的理論的目的在於顯示工會力求工友加薪等於是強制雇主減少金額或減少雇主的消費享受。由於他關懷勞工的福利，所以認為一旦機器在工廠的應用傷害到工人的健康或造成收入遞減時，政府有義務考慮放慢機械化的進程。更進一步，穆勒鼓勵擁有土地與生產資料的小農和自兼任老闆中小企業經營者，從工人的身分變成經營者的地位。過去視經濟「恆定」(stationary state, 定態)，在穆勒眼中有加以重估的必要，因為「當沒有任何人是處於窮困狀態下，則無人願意比別人更富有」。這種靜態的、沒有成長的經濟狀況，將是人對自然漫無止境的開發利用之終結，反而代表著人類道德的重大進步。由此看出小穆勒有阻止漫無目的的經濟成長的心意，更有對大自然小心利用，保護資源使用的先知先覺。穆勒對政府的經濟干預採取存疑的心態，他把關心勞動的福祉與繁榮方面力求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改革。這些改革應當建立在經濟學的真知灼見之上，就這點而言，他的學說正是經典的政治經濟學之巔峰 (Home, 1991: 82)。從此之後英國經典的政治經濟學改由邊際效用學說與馬夏爾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的經濟學 (他把向來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改為經濟學〔economics〕)，而進入新經(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

## 柒、從「經濟人」到「行政人」的演展

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的人性觀是衍生自亞丹·斯密「聰明人」的說法，所謂聰明人無他，乃是擁有理性、有意決定，做出選擇、承擔後果的「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任何懂得精打細算、計較利害、留心得失的行動者，都是廣義的經濟人。

誠如重商主義的先驅李維奕 (Mercier de la Rivière, 1720-1793) 就說過：

個人的利益不斷而急迫地區使每個人，去改善其待售的商品，並使此類的物品數量增加。由於商品的質與量俱增，乃使每個人藉交易而獲得的享受，隨之增加 (de la Rivière, 1909)。

無論是聰明人，還是追求自利的理性人都成為經典理論的基礎，都是經濟人。所謂的經濟人乃是指遵循經濟的理性，而在處理財貨之際，不受其他（宗教、道德、政治、種族、性別、年紀等）因素束縛的人。這是 19 世紀自由主義盛行的英國經濟學家的口頭禪。後來曼徹斯特工業區的自由主義勃興，乃將經濟理性，改易為經濟利益。李嘉圖遂倡說「自利」為一切經濟活動的核心之看法。

於是經濟人成為追求本身利益（且是最大的利益），並且擁有自求多福之權利的人。其後英國政府接受學者的主張，採取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政策，遂確認個人（最先是擁有私有財產、繳納稅金的人）能夠透過其理性，以競爭的方式來追求其本身的利益。蓋每個人最清楚知道自已的權益之所在，而採取有利於自己的行為。站在功利主義者的立場還進一步說，每個人如能獲得最大的利益，全體國民加起來，就無異整個社會得到綜合的、最大的利益。當時學者的想法是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並非互相衝突、互相排斥，而是彼此協調、彼此融通。這種自由主義樂觀的夢想推到極致，必定產生種種流弊。特別是這種自由放任、各行其是的經濟政

策、或社會政策一旦任其蔓延滋長，則弱肉強食的天演論必在社會展現，造成失業、貧富懸殊，甚至人際與階級鬥爭，導致社會危機、政治紛亂。是故英國新經典學派大師馬夏爾遂指出：這種「經濟人」只是便利經濟科學的研究之方便想像的學術概念。真實的人必須顧慮其家庭的福榮、鄰居的和睦、社會的共榮、國家的富強。從而其經濟不單單含蘊利己的初衷，也包括利他的動機（Marshall, 1961: 3）。

另外瑞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者席士蒙地（Simonde de Sismonde, 1773-1842）也認為，人們的經濟行為中摻雜很多非理性的成分。特別是每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機有異，而形式也不同。事實上，「經濟人」只是早期工業時代過程中，英國企業家的樣版。它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成員的形象，也是該時代與該環境的產品（Fürstenberg, 1961: 22-23），這些有紳士風度與榮譽感的，被當成經濟人的典型，可說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紳士的寫照。

約翰·穆勒曾經嘗試解釋「經濟人」，把它當做學理上一個虛擬的形構（figure），而歸根究柢指出「經濟人」所依榜的形式原則無他，乃理性之謂。所謂的理性原則包括下列四種先決條件（Fürstenberg, 1969: 269）：

1. 數種彼此可以相互替代的行為類別之存在；
2. 每種行為類別均能產生明確的結果；
3. 經濟主體對行為所產生的結果，擁有充分的訊息；
4. 經濟主體擁有一套偏好順序表，好讓他依其所好選擇他認為適當的行為類別。

經濟人既是一個能夠運用思考做合理選擇的人，那麼他在經濟生活中便採取「抉擇行徑」（Wahlakt），選擇他認為對自己有利，能發揮最大效用，而又符合社會價值的行徑。

既然理性受社會文化的制約，而經濟主體並無法一時間獲得所有行動所需的資訊，因此未必認清理性之存在。為此 1978 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賽蒙（Herbert A. Simon, 1916-2001）主張以「行政人」來代替經濟人，把人當做資訊、消息有限、能力不高的有機體，以從事接近理性的選擇。

此外，任何人的經濟行為中下決斷、做選擇都在組織的脈絡上進行的，不但公家機關，就是私人公司的組織都與行政有關，故稱「行政人」(Simon, 1961; 1968: 74-79; 洪鎌德, 2005: 250-56)。

## 捌、經濟哲學的理論對體育和運動的意涵

經濟學家所關懷的是稀少性資源如何獲得、挹注、分配和享用。這點和參與運動競賽者如何把稀少的承認與榮譽(金牌、銀盾、錦旗、獎杯等)加以贏取，是持同樣的心態，也可以說出於克服稀少性、匱乏性，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假使物資的稀少性是促成人類在經濟生活中認真工作、追求實利的話，那麼運動場上的每個成員(包括選手、觀眾等)所追求的價值目標也是稀少性、匱乏性的事物。這些稀少性、匱乏性的運動價值，包括有形的金牌、銀盾、獎杯、錦旗、獎金、薪水，也包括稀少難得的無形價值——自我肯定、公眾承認與無上榮譽，後者帶有更多更持久的精神面向。

在進行經濟活動時，經濟人必須運用其理性，進行精打細算的步驟，也需要冒險進行大膽的嘗試(投資與投機)，有時還得忍受不便的犧牲(不把經濟成果一下子享用耗盡，而徐待來日的加倍回報)，克服工作過程上的阻礙，才能達到自利、自足、自滿的地步。同樣地參賽者考驗耐力、毅力，有時還要注意團隊的和諧合作，對手的優勢與弱點，隨時關心、步步為營，才有爭勝拼贏的可能。換言之，理念類型之下的「經濟人」應當是每個選手要學習的榜樣。

經濟生活涉及的是群體的和諧共利，但其活動過程離不開競爭。任何的競爭都有其特定的競爭伙伴，也有競爭的目標，更需要規範——競爭的遊戲規則，這也就是說商場雖然可比擬戰場，但商場與戰場輸贏、拼搏、廝殺都離不開遊戲規則的遵守。同樣在運動場上，競賽場合上，比賽的規矩更是具體而詳盡。任何參選者違背這些遊戲規則(例如服用刺激體力的藥物)都在比賽前被判出局，這表示運動參賽規矩較之經濟生活中的遊戲

規則還嚴格、還周全、還有效。

最後，經濟活動中人最講究的莫過於選手可以最少代價獲得最大報酬。這也是經濟這個字眼相當於節省、儉用的華文（中文）之本意（在古希臘文則為家計、戶政的安排之意思）。同樣在運動場上奔馳的選手，也在花費有限的體力，造成無限的榮譽之作法。尤其如何講究專心致志、沈毅堅決，把矯健體魄轉化成令人讚佩和承認的運動表現，也是效率提升到最大的意思。是故經濟與運動都需要講究效率、展現效率、發揮有效性。

## 玖、後語

現代運動場上，比賽場合的各種競技活動雖然發源於古希臘的文明（特別是奧林匹亞運動會的首創，與巴爾幹半島南端的港灣特多、山海交界和群島的星羅棋布之地理和氣候息息相關），而卻在近現代中重現於英倫三島。英國人對運動的熱衷，對運動相關技術的講究、學理的闡述、體育教育的推行，而成為歐洲乃至世界各國的模範。這固然有其地理優勢與氣候適當，但與其人文思想、人本主義的重視提倡也有關連（洪鎌德，2009）。

英國的人文思想和人本主義表現在 18 世紀蘇格蘭啓蒙運動幾位大師的知識活動與著作中，其中又以休謨（David Hume, 1711-76）的懷疑論，費居遜（Adam Ferguson, 1723-1816）的民間（市民）社會、斯密的自由市場與國際貿易論最受矚目。在此之前，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思想方法工具論，霍布士（Thomas Hobbes, 1588-1679）天賦人權與社會契約說，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民主理論，不只影響英國的憲政與議會民主，也成為其後政治哲學的復興與社會契約說的流行，促成全球自由與民主的推動。

近現代英國的政局之走向自由、民主、法治，不需藉暴力流血的革命，把政治權力與君主移向貴族等資產階級，再藉社會改良，以和平的方式擴大選舉權、參政權於一般國民之上，這就提供社會公平競爭，選票決定政

權的轉移，造成英式立憲、法治、民主、自由的社會。以經驗主義、理性主義，甚至功利主義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所以在英國出現和茁壯，顯然與英國自 1215 年首創的『大憲章』(*magna charta*) 有關，也與英國光榮革命的傳統有關。更是分辨政治國家與民間社會之不同學者把注意力從國家的公權力轉向民間自動自發、生機活潑的財貨安排(市場機制、自由契約、公平交易)，無異把時代進步的主力從政治移向經濟。政經學者之努力也有利於民生資源分配的合理化，儘管離開平等的理想還有一大段距離。顯然經典的政治經濟學所強調的理性、和平、自利的競爭，有利於理性人、經濟人、行政人之出現，亦即典型的英國紳士作風之推廣。

在今日寰球經濟衰歇、金融海嘯衝擊下，使我們想到經典政治經濟學與資本主義興衰的關連。斯密主張起碼的國家、有限的政府乃為 18 世紀英國一國範圍內的小型資本主義 (*minimal capitalism*)，但其後馬克思所抨擊的是競爭激烈、獨霸性極大的壟斷性資本主義 (*monopoly capitalism*)。及至 20 世紀上半葉凱因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所提出的充分就業理論與羅斯福總統新政 (*New Deal*) 的資本主義，已經是含有政府公共財政的干預刺激有效與累積需要的混合型 (*mixed economy*) 之資本主義。不料這種接近福利國家措施的經濟政策之實施導致美國 1990 年代以來房貸的大舉膨脹，由於美國財政危機引發寰球的金融海嘯，由是跨國公司所造成的組混合型資本主義 (*corporate capitalism*) 之危機遂表現無遺。今後資本主義雖不致完全崩盤，但需靠 G20 發揮的金融支援，以及有效的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或可望讓資本主義的可塑性 (*malleability*) 重新發揮其浴火鳳凰的再生作用，這是美國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羅維克 (*Dani Rodrik*) 的新看法 (*Rodrik, 2009*)。

英國紳士公平與良性的風範，對體育競技與運動精神的提倡明顯有助益。這也是本文作者大膽斷言，英國人的熱衷體育運動、熱心競技比賽，大力提倡運動與體育教育，與其民族性格、地理環境、政經發達、長治久安有相當程度的關連，而經典的政治經濟學標榜的合作、理性、競爭、扶

擇、自利之經濟人特徵，也可以應用到運動者、體育家之參賽、競技等活動之上，更是鼓舞廣大民眾參與強心健身的全民性休閒、娛樂、運動之上。

## 參考書目

- 洪鎌德。2005。《當代政治經濟學（修訂版）》。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09。《人本主義與人文學科》。台北：五南。
- Blaug, Mark. 1968a. “Ricardo, David,”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13*, pp. 507-12. New York: Macmillan.
- Blaug, Mark. 1968b. “Malthus, Thomas Robert,”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9*, pp. 549-52. New York: Macmillan.
- De la Rivière, Mercier. 1909 [1767].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Paris: Larousse.
- Fürstenberg, Friedrich. 1961. *Wirtschaftssoziologi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Fürstenberg, Friedrich. 1969. “Wirtschaftssoziologie,” in G. Eisermann, hrsg. *Die Lehre von der Gesellschaft*.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
- Home, Thomas A. 1991.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David Mill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pp. 79-82. Oxford: Blackwell.
- Leduc, Gaston. 1968. “Say, Jean-Baptiste,”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14*, pp. 23-25. New York: Macmillan.
- Marshall, Alfred. 1961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9<sup>th</sup> ed. New York: Macmillan.
- McLellan, David. 1991 [1983]. “Political Economy,” in Tom Bottomore,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pp. 426-28. Oxford: Blackwell.
- Rodrik, Dani. 2009. “Coming Soon: Capitalism 3.0.” *Business Standard*, February 11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ia/news/dani-rodrik-coming-soon-capitalism-30/00/27/348673/>) (2009/6/15).
- Simon, Herbert A. 1961 [1947].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Simon, Herbert A. 1968.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1*, pp. 74-79. New York: Macmillan.
- Smith, Adam. 1949 [1759]. *Theorie der ethischen Gefühle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Neuausgabe von H. G. Schacht. Frankfurt a. M.: Fischer.
- Viner, Jacob. 1968. “Smith, Adam,”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4*, pp. 322-28. New York: Macmillan.

#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s Model of “Homo Oeconomicus”: A Brief Exposition

Lien-te Hung

*Concurre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Yu-hsin Liao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theoreticians and their ideas of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Adam Steuart. It discusses firstly Adam Smith's classical work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his original view of wealth as residing in and arising from commodities, the output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commercial markets. The treatise then briefly expounds Ricardo's theory of comparative low cost of production among the trading countries. Subsequently, Malthus' theory of unequal growth of food and population is touched upon. Eventually, the essay considers Say's law of "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 and John Stuart Mill'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studies. Finally, the implications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omo oeconomicus*" are critically evaluated.

**Keywords:** *homo oeconomicus*, division of labor, commerce and liberty, laissez faire, Say's Law